

改革开放前中国女性着装中性化的影响因素

张 玲

(日本爱知大学 国际中国研究中心, 日本 名古屋 461-8641)

摘 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女性在形象上最大的特征就是着装中性化。这些中性着装被认为是对女性性的否定。在对当时女性着装中性化历史进行详细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对目前看似已成定论的“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导说”予以考证,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女性在中性着装上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早期,女性对于中性服装的选择基本属于个人意愿,政治因素只是在中后期才开始发生重要作用,因此不能一概将之归因于“政治与国家意识主导”。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女性着装;中性化;成因机制;列宁装

中图分类号:TS 9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8)05-0438-07

Effecting Factors of Chinese Women's Genderless Dres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Li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ichi University, Nagoya 461-8641, Japan)

Abstract: Most Chinese women wore the Lenin coat, Mao suits or Army surplus clothes only before 1970s. These clothes were thought of the negation of women.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history of women's genderless dress during that period in detail. The accepted opinion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ology, was then argued. It was pointed that Chinese women's genderless dress before 1970s was a gradual process. In the earlier period, the choice for dress was almost a personal willingness. Political factors only affected the choice in the later period. Therefore, it was unreasonable to think it was only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force and national ideology.

Key word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omen's dress, genderless, mechanism, Lenin coat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转变在妇女着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女性的典型穿着就是单色列宁装、军装和军便装,显然这些服装都不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是男女通用的“中性服装”,它们在直观上塑造了建国初期新中国女性的中性化形象。韩敏^[1]将当时女性衣着评价为:“将女性身体包裹在黑、蓝、灰色的劳动制服下面,方便女性进行劳动生产的同时,拒绝表现女性身体的性别特征。”

对当时女性中性着装问题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史实性记录,如黄土龙^[2]《中国服饰史略》,成平等^[3]《百年中国女性形象》,袁仄等^[4]《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华梅^[5]《中国服饰

史》等。第二种将这个时期的女性着装视为一种超出常轨的社会现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侧面对其加以解读。杨清^[6]认为列宁装是女性对男女平等愿望的强调与体现,汤锐^[7]认为列宁装的流行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是国家话语在女性生活中的反映。许星^[8]提出列宁装流行的原因是人们的审美标准受到政治态度的影响。山内智惠美^[9]指出“文革”时期,着装男女不分现象归因于政治运动与社会意识形态。目前此类相关研究并不活跃,研究较为详实的有孙沛东^[10]针对“文革”时期讨伐“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指出国家的规训机制,即政治、消费约制和心理是影响当时女性着装的决定因素。总之,对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女性的

收稿日期:2018-02-22; 修订日期:2018-08-29。

作者简介:张 玲(1975—),女,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Email:zhanglingrefresh@outlook.jp

着装问题,多数分析将之归因于受到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由于研究是基于个别的服装类型,因此,当把历史时段拉长,将焦点放在“中性着装”问题上进行思考时,部分史实未能在前述结论中得到合理解释。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团中央和全国妇联曾经发起过提倡穿花衣运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报》等主要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倡导。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国家话语,因此该现象表明,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压力导致女性着装中性化的见解还有待证实。此外,1974 年江青也曾经在权力顶峰时期发起了一次“服装革命”,在全国几大城市强制推广所谓的“江青裙”,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也说明女性的着装选择并非受政治的绝对支配。因而在解答为何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女性着装呈中性化这个问题时,还需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论证与考察。

文中通过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女性中性着装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分析,对目前看似已成定论的“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导说”予以考证,揭示制约当时女性形象建构的因素,从而为更准确地理解新中国妇女着装历史提供事实依据。由于中国农村妇女的服装变革往往模仿城市女性,因此文中主要选取城市女性作为观察对象。

1 中国女性的着装历史

1.1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女性着装

近代以前,中国妇女着装一直延续着古代传统的服装样式,即上衣下裙制。它在基本式样上没有太多变化,至多只是镶滚花边的宽窄,或纽扣花纹不同而已。对此情况,张爱玲曾在《更衣记》中感叹到:“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服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11]

20 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君主统治被推翻。为一扫封建残余思想,民国政府在服饰方面实施了包括易服、剪辫等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在欧美各地兴起。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中国女性的着装发生了巨大改变。先是女学生的穿着成为潮流,继而日本女式改良服装受到追捧。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现代旗袍开始出现,并在此后的 20~30 年间成为女性着装的主流。与传统女性服装相比,旗袍强调女性的曲线之美,故腰身收紧,紧贴女性身体。此后旗袍尽管在细节部分(如领口的高低、袖子的长短、开叉的高低等)不断变化,但

其基本款式始终保持不变。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12]。

同时西洋服饰也受到女性欢迎,如女性结婚时开始流行穿着西洋式婚纱,西装、西洋帽子、西洋丝袜、高跟鞋等均风靡一时。对于当时追逐西洋服饰的这股风潮,有人甚至著文表示鄙视,如《着丝袜是吃外国屁》^[13],从标题就能感受到作者的愤懑情绪。这一时期女性在着装上渐趋大胆。图 1 为 20 世纪 30 年代身穿肚兜裙的时髦女性。由图 1 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人尝试吊带露背的性感装扮。图 2 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月份牌。图 2 中的女子身穿热裤短衫,长腿尽显,酥胸半露。虽然她的装扮未必与现实一致,但在素以迎合大众为己任的广告中出现此类形象,多少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等大城市的女性对衣着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



图 1 20 世纪 30 年代身穿肚兜裙的时髦女性
Fig.1 Girl with shoulder bare and long dress in 1930s



图 2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月份牌
Fig.2 Calender picture of old Shanghai in 1930s

此外,人们开始追求奢华之风。“上海有钱的人,最喜欢置备衣服,妇女尤甚,三日二朝做新衣,穿了几天,觉得不出风头了,便向箱子里一塞。”^[14]为了阻止奢靡之风蔓延,提倡健康的生活,从

1934年开始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装扮应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尽管如此，女子们在着装上也还是“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旁杂之不可名状”^[15]，人们对女性服装的见解也是多种多样。在当时的《妇女杂志》上就曾登载了许多文章热议女性服饰，如《女子服装的改良》^[16]《一个妇女衣着的适切问题》^[17]《现代妇女时装热》^[18]《对时髦女子的感想》^[19]等。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女性着装呈现中西古今并存、百花齐放的景象，而强调女性身体曲线特征的旗袍尤其受到欢迎。

1.2 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着装

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形戛然而止，女性着装变得简单而朴素。日本民俗学家鸟居龙藏对此曾这样描述：“在中国，衣服完全变样了……所到之处大家都穿着无产阶级式样或者是黑色、灰色的农民服装，妇女们都穿裤子，着装跟男士完全一样。”^[20]这里所指的“无产阶级式样”服装，对于女性来说实际上就是“列宁装”。

“列宁装”源于20世纪初前苏联及东欧男性日常的上衣款式，由于当时苏联领袖列宁经常穿着此种服装，所以将之称为列宁装^[21]。其特征是上衣为西服小翻领、双排扣、斜纹布；有单衣也有棉衣，腰间加同色布腰带；双排各有3粒纽扣（也有4粒的）；双侧衣襟下方均带一个暗袋，可以是平袋或斜袋。它于抗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流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在全国受到追捧。20世纪50年代的老画报里出现的进步女性形象，上至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下至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几乎都以身穿列宁装的形象出现，具体如图3、图4所示。



图3 身着列宁装的宋庆龄

Fig.3 Soong Chingling dressed in Lenin coat

如果说列宁装是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风向标，那么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军装与军便装则成为年轻人的最爱。军装是指当时

军人使用的六五式军装，而军便装则是仿照六五式军装的民间自制服装。由于军装属于配发，一般人无法轻易获得，对此曾有人回忆：“到哪里去求一套军装呢？我的母亲见我想穿军装，就买了块白棉布染成黄绿色，为我做了一件仿军装。”^[22]仿军装就是军便装。军装与军便装风靡了整个“文革”10年，以至于有“祖国山河一片绿”“十亿人民十亿兵”等俗语产生。



图4 20世纪50年代初期身着列宁装的进步女性

Fig.4 Chinese women dressed in Lenin coat in 1950s

总之，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女性着装的主要特点就是简洁、朴素、颜色单调，除了尺寸的区别以外，服装在外形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妇女着装中性化是其留给人们的直观印象。

2 新中国妇女着装中性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6年)

建国伊始，妇女着装中性化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列宁装的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列宁装从抗日革命根据地迅速向全国普及，从1949年到1965年，列宁装成为中国女性着装的主流^[23]。列宁装早期的流行与其说是受国家意识引导，倒不如说是女性心甘情愿的个人选择。

早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年轻女性就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之情，冲破重重阻力，奔向延安。她们大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高校接受教育与培训。由于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她们的服装完全靠配发，“穿的是灰布军装，夏天一身单，冬天一身棉。”^[24]虽然统一的军装模糊了男女性别，但女学员却尽量想办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展示自身女性美。有人把津贴节省下来，买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有一朵小花；有人在制服的袖子、领口上镶嵌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25]。

据延安女子大学学员回忆，1940年中国女子大学学员们仿照苏联男性服装式样，自己裁剪缝制出

大翻领、双排扣、用腰带束紧腰身的校服,巧妙地展现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曲线,这种样式的服装后来被称为列宁装。女学员们身着列宁装在三八妇女节表演集体舞蹈,这次表演轰动了延安^[26],列宁装由此在革命根据地风靡。可见列宁装最初在中国的流行,与其说是为了掩盖女性的性向特征,倒不如说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女学员们对女性美的一种大方强调与展示。

新中国建立后,女学员们大多成长为女干部,她们虽然已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打扮自己,但列宁装依然是她们的主要选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许多女性代表,都身着列宁装出席会议,具体如图5所示。她们选择列宁装的主要原因有3点:①从抗日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女性干部长期以来身穿列宁装南征北战,列宁装已经成为她们身份地位的符号象征;②列宁装符合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勤俭节约”消费观与价值观;③女性通过身穿列宁装来主张“男女平等”。



图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女性代表
Fig.5 Women delegates in the first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1949

新中国成立伊始,“严惩贪污,禁止浪费”被写进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于当时的女干部,长期身着列宁装而不置办新装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对党“勤俭节约”方针的遵守与赞同。此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男女平等,积极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早在1931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明确宣称:男女一律平等。当时,许多进步女性正是为此而投奔延安。通过本是男性日常着装的列宁装来诉求男女平等的心声,这也是建国后女性干部依然钟爱列宁装的理由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通过着男装来主张男女平等思想的现象早已出现,北方晴子曾指出:19世纪中叶,在欧美等地已经出现女性着男装的趋势,这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直接联系^[27]。中国女

权主义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康有为,也曾强调女子与男子异服是因为“女子为男子私有之物,但供男子玩弄,故穿耳,裹足,细腰,……施脂,抹粉……”,因此,男女平等“宜定服装之制,女子男子服同一律”^[28]。陈文联^[29]认为这些早期朴素女权主义思想(feminism)的产生具有政治化与男性化两大倾向。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发展为对女性经济独立与参政权的要求,并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相联系,“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30]

据统计,在当时投奔延安的女性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31],显然她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对当时先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已经有所接触。事实上,她们放弃传统的“相夫教子”生活,投奔延安的行为本身就具有着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来到延安后,“一般说来,女同志的好胜心理都超过男的,……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积极克服自己的女儿态,……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32]因此,当时的进步女性们在衣食住行上以男性标准要求自己,这些“脱女性”行为与其说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倒不如说是由当时的女权主义而生,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之前就已扎根在进步女性心中。当然不可否认,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当时的女权主义本身有许多共通之处,进步女性后来在延安接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又巩固与深化了她们已有的认识。

在服装流行的分析上,ジンメル(齐美尔)^[33]“涓滴理论”(trickle down)是传统经典之一。他认为“流行”就如同水滴渐渐向下渗透一样,是由上层阶级开始带动,下层阶级逐渐模仿的过程。显然,建国初期若干年间,列宁装的流行印证了这个理论。党的妇女干部被视为先进女性的代表,她们对列宁装的喜爱引发了全国各阶层女性的模仿。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就曾回忆道:“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渴望着工作。”^[34]

普通女性在模仿女干部的同时,也舍弃了对传统女性服装的渴望。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坚持妇女传统装束的保守中坚势力大幅削弱。留下来的女性多对共产党充满向往,她们期望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一套崭新的社会体制与社会文化,因此她们摒弃包括传统女性服饰在内的所谓旧

事物,对作为新时代象征的列宁装充满了期望。

除了这种艳羡心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也在增强。据统计,1951年社会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22%左右,1952年比1951年增加25%左右^[35]。女性们有余力采购或定做自己渴望的服装,因此列宁装迅速在全国流行与普及。

这一时期列宁装的流行实际上与此前“旗袍”的流行一样,主要基于女性自身的审美基准与个人选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小。相反“穿制服的男女一年多似一年,近一二年不但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穿制服,而且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甚至连小学生也有不少穿上了制服。”^[36]由于列宁装的过渡泛滥,妇联和共青团中央曾一度掀起服装美化运动,力图丰富女性的着装文化。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媒体与杂志开始陆续刊发文章,提倡多样的服装文化。例如,1954年9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中指出:“改变男女老少都穿蓝布制服的习惯,也会节约很多布料,并且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37]《新中国妇女》刊登《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38]一文,指出每个人应以自己的打扮帮助和丰富集体聚会活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也在同年的《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谈谈服装问题》^[36],号召女干部带头穿花衣服。1956年2月1日,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专就改进服装式样、剪裁和色彩召开座谈会,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指出,服装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在越过越好,人民的服装也必须越来越美丽,他特别希望男女青年带头把自己美化起来^[39]。1956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让我们的服装更漂亮更多样》^[40]为题,大幅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图案。同年6月,由上海市妇联、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时装博览会在上海和北京同时展出。

恰好这一时期苏联花布产量过剩,为了加强中苏关系,也为了弥补我国棉布短缺状况,中国从苏联进口了大量花布^[41]。有了这个物质基础,服装美化运动得到顺利开展,旗袍重新回归,苏式连衣裙布拉吉在全国得到普及。

2.2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1957—1965年)

在相关组织与舆论的引导下,旗袍重新回归,苏式连衣裙布拉吉风靡。就在女性着装似乎又要迎来生机勃勃的局面时,社会环境却悄然转变。

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无法为工业生产提供足够原料,民生用品消费被限制在最小范围,从而摧毁了女性服装选择与消费的物质基础。

伴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个体裁缝店大量消失。1954年国家颁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棉纱、棉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并采取凭票供应的政策。由于农业衰退,国家分配给居民的布票年年减少。1959—1961年3年困难时期,做一套衣裤需15尺(5 m)布料,每人每年只能拿到2尺半(0.83 m)布票和2两(0.1 kg)棉花票,这只够用来打补丁^[42]。“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全民基本的服装消费模式。此外,当时社会被笼罩在非友即敌的两分化意识之中,女性如何着装也被认为是阶级性的表现。

1964年5月,上海一家服装店拒绝按照顾客要求将裤脚做小,店家认为“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围绕这一事件,1964年6—11月,《解放日报》“大家谈”专栏就“奇装异服”进行了讨论,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应^[43]。该论战使“‘奇装异服’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得到普及与强化,这也为后来的“破四旧”运动提供了思想背景。

在服装流行的古典社会学分析方面,范伯伦(VEBLEN T B)在其《有闲阶级论》^[44]中指出,服饰是一种符号,上层阶级依靠它炫耀身份、地位与财富。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记号论,认为衣服的作用不仅在于炫耀,人们通过它建构与确认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的阶级或阶层属性^[45]。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服装作为“记号”的功能逐渐被放大。身着列宁装既是先进革命女性的象征,也是无产阶级属性的表现,女性可由此获得阶级认同感与政治安全。

2.3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在“文革”开始前,曾风靡大江南北的列宁装已因中苏关系紧张而逐渐退出了女性着装的舞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军装与军便服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如果说当年列宁装流行的起点在于延安女子学员对女性美的展示,那么“文革”10年军装与军便服的流行则主要是受政治的影响。女性们对军装的渴望不是基于对服装本身的保暖性与装饰性要求,而在于它蕴含的政治意义。此时,服装作为“记号”的功能被无限放大。

军装,是军人的专有制服,除了护身功能以外,它通常还体现军人的威武与坚强不屈。由于宣传教育的作用,军人被视为英雄的化身,当时的男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向往着成为一名军人,他们把对军人的崇敬表现在拥有一套军装。另外国家

领导人在各种重要活动中大多身着军装,因此,对领袖的崇拜也是军装流行的重要因素。年轻女性对六五式军装的追捧程度亦是如此。虽然六五式军装有男女之分,但男女军服外形上的差异极小,即便女式军装强调的也是军人的威武硬朗而非女性的温柔妩媚。此外,女子们试图通过军装来展示男女平等也是六五式其在女性中广泛普及的影响因素之一。女子钟爱军装的现象在列宁装流行时已有所表现,其后又被进一步强化。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公开发表,使女子以男性化为荣的风潮达到历史顶峰。在如此社会风潮下,绿军装毫无悬念成为时代少女的最爱。但不可否认,当时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已偏离轨道,人们机械地将男女同一化认为是男女平等的表现,男女间的性差异被刻意漠视。“不爱红妆爱武装”是当时女性们热衷追求的“革命时髦”,但其实,“当年她们心里想爱‘红妆’也不行,‘红装’包括的一切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全属“资产阶级”的一套。”^[46]

另外,受“破四旧”的影响,人们对“奇装异服”唯恐避之不及,就连首都北京也几乎没有一家民用服装厂承做裙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装成为女性“没有选择的选择”,由此酿就的女性中性化着装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党中央的明确号召下,女性才逐渐打破思想禁锢,敢于用多彩的服饰来展示与丰富自身的女性美。

3 结 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女性在着装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跌宕起伏的变化,党和国家的许多方针政策处于不断探索调整中。因此文中将这段历史予以细分,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当时中国女性中性着装的各种要素进行考察,指出当时中国女性的中性着装现象并非完全源于目前普遍主张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诱导”。列宁装最初的流行基本源于延安女子学员对女性美的展示与渴望,后来尽管女性学员脱离了必须穿着军装的环境,但在男女平等与艰苦朴素意识的影响下,仍然保留了身着列宁装的习惯。这种选择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在女性党员干部带动下,建国后列宁装受到各阶层女性的欢迎,这同样基于当时女性自身的审美基准与个人选择,政治没有对之多加干涉。但随着

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着装行为也日益成为带有阶级色彩的政治行为。政治对包括着装在内的民生问题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文革”时期达到最高潮。人们不再重视服装的样式与机能,却更在意由服装所表达的种种政治含义,服装作为记号的价值在这里得到典型体现。

因此,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女性的着装中性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由当初女性的个人自由选择慢慢地变化为受社会思潮影响的非自主行为。政治因素虽然在中后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概将当时妇女中性化着装的影响因素归结于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则难免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 [1] 韩敏. 新中国妇女的视觉形象建构[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11-28(A08).
- [2] 黄士龙. 中国服饰史略[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4.
- [3] 成平, 陈惠芬, 李子云. 美镜头: 百年中国女性形象[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
- [4] 袁仄, 胡月. 百年衣裳: 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5] 华梅. 中国服装史[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 [6] 杨清. 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看列宁装[J]. 美与时代(上), 2012(4): 80-82.
YANG Qing. How Lenin coat show the social status of Chinese women[J]. Beauty and Times, 2012(4): 80-82. (in Chinese)
- [7] 汤锐. 审美与政治: 20世纪50年代城市女性流行服饰探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7, 29(4): 81-89.
TANG Rui.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nalysis of urban women fashion during the 1950s[J].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2017, 29(4): 81-89. (in Chinese)
- [8] 许星. 论20世纪五十年代苏式服装在中国的兴衰[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8(6): 182-183.
XU X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style clothing in China during 1950s[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and Design), 2008(6): 182-183. (in Chinese)
- [9] 山内智惠美.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の服飾変遷[J]. 北海道文教大学論集, 2013(14): 25-34.
YAMAUCHI C. The uniform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J]. Journal of Hokkaido Bunkyo University, 2013(14): 25-34. (in Chinese)
- [10] 孙沛东.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J]. 开放时代, 2012(4): 92-113.
SUN Peidong. Analysis of the dress fash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J]. Open Times, 2012(4): 92-113. (in Chinese)

- [11] 张爱玲. 更衣记[M]//张爱玲. 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19-28.
- [12] 徐华龙. 上海服装文化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74.
- [13] 漱六山房. 着丝袜是吃外国屁[M]//冯金牛. 闲者的盛宴.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96-198.
- [14] 范菊高. 上海颜色问题[J]. 新上海,1925(3):115-120. FAN Jugao. The color of Shanghai[J]. Journal of New Shanghai, 1925(3):115-120. (in Chinese)
- [15] 佚名. 闲评二[N]. 申报,1912-09-08.
- [16] 庄开伯. 女子服装的改良[J]. 妇女杂志,1921,7(9):39-44. ZHUANG Kaibo. Improvement of women's clothing[J]. Journal of Women, 1921, 7(9):39-44. (in Chinese)
- [17] 寓一. 一个妇女衣装的适切问题[J]. 妇女杂志,1930,16(5):46-50. YU Yi. Question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 woman's dress [J]. Journal of Women, 1930, 16(5):46-50. (in Chinese)
- [18] 仲华. 现代妇女时装热[J]. 妇女杂志,1930,16(12):59-61. ZHONG Hua. Modern women's fashion fever[J]. Journal of Women, 1930,16(12):59-61. (in Chinese)
- [19] 吴淇. 对于时髦女子的感想:我的时髦女子观[J]. 妇女杂志,1931,17(11):65-66. WU Qi. Impressions of fashionable women; my fashionable women's view[J]. Journal of Women, 1931,17(11):65-66. (in Chinese)
- [20] 鸟居龙藏. 服は銀鼠:黒の一色、一変した北京[N]. 読売新聞,1951-12-09.
- [21] 陈煜.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服装[J] 传承,2009(17):62-63. CHEN Yu. Fashion in 1950s[J].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2009(17):62-63. (in Chinese)
- [22] 汤礼春. 军装与粮票的记忆[J]. 山西老年,2012(4):25. TANG Lichun. Memory about military uniform and grain coupon[J]. Journal of Shanxi Seniors, 2012(4):25. (in Chinese)
- [23] 李子云,陈惠芬,成平. チャイナガールの1 世紀——女性たちの写真が語るもうひとつの中国史[M]. 东京:三元社,2009:142.
- [24] 丁雪松. 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75-276.
- [25] 朱鸿召.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71.
- [26] 徐岚. 女大的劳动生活[M]//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 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253.
- [27] 北方晴子. メンズファッションと未来派[J]. 文化女子大学紀要(服装学造形学研究),2007(38):39-52. KITAKATA H. Men's fashion and futurism[J]. Journal of Bunka Women's University (Studies on Fashion Science and Art Design), 2007(38):39-52. (in Chinese)
- [28] 康有为. 大同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56:162-163.
- [29] 陈文联. 政治化与男性化: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两种倾向[J].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4,14(2):45-51. CHEN Wenlian. Politicization and masculination: two tendencies of feminism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J]. Journal of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2014,14(2):45-51. (in Chinese)
- [30] 金一. 女界钟[M]. 上海:大同书局,1903:63-67.
- [31] 王明同志在女大开学典礼上的报告(续)[N]. 新中华报,1939-08-11(4).
- [32] 谢克. 延安 10 年[M]. 上海: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66-67.
- [33] ジンメル. ジンメル著作集 7:文化の哲学[M]. 円子修平,大久保健治,译. 东京:白水社,1999.
- [34] 苏秀. 我的配音生涯[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 [35] 陈廷煊,匡家在. 居民的收入分配与消费[M]//吴承明,董志凯.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917.
- [36] 张琴秋. 谈谈服装问题[J]. 新观察,1955(11):16. ZHANG Qingqiu. About dressing [J]. Journal of New Observation,1955(11):16. (in Chinese)
- [37] 人民日报社. 贯彻棉花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N]. 人民日报,1954-09-17(1).
- [38] 郁风.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J]. 新中国妇女,1955(3):32. YU Feng. About women's dress today[J]. Journal of New Chinese Women,1955(3):32. (in Chinese)
- [39] 新华社. 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座谈会讨论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N]. 人民日报,1956-02-02(3).
- [40] 佚名. 让我们的服装更漂亮更多样[N]. 中国青年报,1956-03-17(副刊版).
- [41] 杨雅萍. 红配绿的大花布是如何变成东北特产的[EB/OL]. (2018-01-08)[2018-02-18]. https://mp.weixin.qq.com/s/pSWqVsbq9wOLvqd2Jbs_TQ.
- [42] 吕斌. 有关布票的那些事[J]. 文史天地,2017(5):76-80. LYU Bin. The memory about cloth ticket [J]. World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2017(5):76-80. (in Chinese)
- [43] 佚名. 一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斗争——解放日报关于抵制奇装异服的讨论引起读者热烈反应[J]. 新闻战线,1964(增刊1):22-23. ANON. A struggle against the erosion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way of life—the discussion in *Jiefang Daily* about the resistance to strange clothing aroused a heated response from readers [J]. The Press, 1964 (Sup1):22-23. (in Chinese)
- [44] VEBLEN T B. 有閑階級の理論[M]. 小原敬士,译. 东京:岩波书店,1961.
- [45] BAUDRILLARD J. 物の体系——記号の消費[M]. 宇波彰,译.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
- [46] 梁晓声.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344. (责任编辑:沈天琦,邢宝妹)